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瑞士〕西斯蒙第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或
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

〔瑞士〕西斯蒙第 著

何 钦 译



商 管 中 書 馆

1997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今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现在刊行五十种，今后打算逐年陆续汇印，经过若干年后当能显出系统性来。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1年1月

評西斯蒙第的《政治 經濟學新原理》

林 森 木

(一)

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西斯蒙第(1773—1842)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又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出生于瑞士的法语居民居住区，属于法国学者的行列。在经济学说史上，西斯蒙第处于特殊的地位；他是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出版于1819年，这本书是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西斯蒙第恰好生活在大机器工业在欧洲大陆刚刚开始发展的时期。这个时代的特征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地得到发展，这种发展在法国大革命消灭了封建残余以后表现得特别明显。尽管封建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竭尽全力企图阻止这种发展；但是，即使是在欧洲出现政治反动的局面下，资本主义仍然在胜利地前进。在欧洲各国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洪流不断地冲击着封建主义制度的基础。

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胜利，也就是大生产对小生产的胜利。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摧毁着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也瓦解着和排

挤着小商品生产；資产阶级的胜利不仅推翻了封建貴族，也使中世纪的小市民和小农处在动荡和不断破产的境况之中。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了、并且作为資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而經常重新形成着新的小商品生产者，即小資产阶级。但是，竞争經常把这一阶级的成员扔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只有其中的少数人发了財上升到大資产阶级的地位。因此，小生产者开始觉察到，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們很快会完全失去他們作为資产阶级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他們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員所代替。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必然会出现反映小資产阶级利益和願望的理論家。西斯蒙第就是这方面的头面人物和典型表述者，他的《政治經濟學新原理》系統地論证了小資产阶级的利益和願望。

小資产阶级是过渡性的阶级，处在資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間。小資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地位，使得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劳动者，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它貧困和破产，因而倾向于无产阶级；另一方面是私有者，倾向于資产阶级。西斯蒙第的《新原理》充分地反映出小資产阶级的中間地位和两面性。

《新原理》的作者在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观点上深受資产阶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影响。和斯密以来的一切古典经济学家一样，西斯蒙第在价值学說方面承认商品的交換价值由生产商品时所耗費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原理；在关于剩余价值的問題上，把利潤和地租看为是工人劳动产品的扣除，是額外价值；在对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的分析方面，接受“斯密的教条”，认为年产品的价值只分解为收入，抛棄了不变資本部分。但西斯蒙第处于当时的主要思

潮之外，热烈拥护小生产，反对资本主义大企业经济及其维护者。

在《新原理》中，西斯蒙第否认自由竞争具有无限优越性的说法，指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否认资本主义矛盾和把资本主义说成是合理的自然制度，并具体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马克思指出：“如果说在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无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那末，西斯蒙第则表现了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从而对这个结束作了补充。”^①这就是说，李嘉图虽然意识到工资与利润对立、利润与地租对立，但他认为这是自然的现象；而西斯蒙第则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的问题。

西斯蒙第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矛盾。他感觉到资本主义生产是自相矛盾的，它一方面刺激生产力和财富的自由发展，另一方面又限制着这种发展。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间的矛盾，商品和货币间的矛盾，买和卖的矛盾，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矛盾等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些矛盾也将发展。他还觉察到这样一种根本性的矛盾：一方面是生产力和财富的无限发展，另一方面劳动群众只能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在他看来，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必然会发生，它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必然结果。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方面把绝对意义上的劳动（因为在他们看来，雇佣劳动和劳动是等同的），另一方面又把同样绝对意义上的资本，把工人的贫困和不劳动者的财富同时说成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他们不断地在绝对的矛盾中运动而毫不觉察。（西斯蒙第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1页。

由于觉察到了这种矛盾而在政治经济学上开辟了一个时代。)”^①

西斯蒙第为了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毫不犹豫地指责资本主义的发展，抨击“后果严重的竞争”。但是，对于这一切，他总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来衡量。他用独立的小生产，即农村中的农民自然经济和城市中的手工业，来反对资本主义；斥责资本主义破坏了小生产者的有保障的生活，妨碍了他们之间互相接近，即手工业者接近消费者，农民接近和他平等的农民；颂扬小生产保证了生产者的独立性和没有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

西斯蒙第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但他不了解资本主义矛盾，没有试图去分析资本主义矛盾的起源、发展和趋势，他把它们看为是反常的或错误的偏向，看为是学说和政策、措施等等的矛盾或错误。同时，他也不了解资本主义矛盾的解决过程。他反对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希望用别种办法来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他希望依照资本的比例来调节收入，或依照生产的比例来调节分配，以此来消除矛盾。他想恢复生产的正确比例（这是一种为小生产所特有的“正确比例”），又要保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因此企图把中世纪的行会和宗法制的原则和思想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里来。

西斯蒙第反对资本主义大生产，而把独立的小生产看为是自然制度。他不懂得资本主义大生产和独立的小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懂得这是商品生产的两种形式。他反对资本主义大生产，也就是反对商品经济的最发达的形式，而把小生产捧上了天，也就是把商品经济的萌芽形式捧上了天。他不了解他所偏爱的农民小生产者和手工业者实际上已经成为小资产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册，第285页。

典作家们正是根据这一点，评定西斯蒙第是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家，指出他的观点是“反动的”。

说西斯蒙第的观点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决不是说西斯蒙第维护落后的小资产者，同情小店主的自私自利的心理或阻止社会发展、向后倒退的愿望。西斯蒙第在任何地方都沒有维护他们，他想站在一般劳动阶级的立场，他表示自己同情这些阶级的代表，例如他因工厂立法而感到高兴，他攻击资本主义并指出它的矛盾。这些术语只是说明西斯蒙第的观点是错误的，他的理解和眼光是狭隘的，因而他所选择的达到一个十分美好的目的的手段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它只能满足小生产者或为复古主义者服务。

马克思在说明把不同作家的理论归结为不同阶级的利益和观点时指出：“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超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①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2页。

使全体居民都能获得物质上的享受。

从这种見解出发，西斯蒙第給政治經濟學的对象下了一个定义：“从政府的事业来看，人們的物质福利是政治經濟學的对象。”（本书第 22 頁）这个定义表明了西斯蒙第把社会經濟发展过程看作是由国家調整和指导的过程，把政治經濟學和国家的政策混为一談。他在《新原理》中不是、或者說主要的不是說明社会經濟生活的內在联系是什么样的，而是孜孜不倦地告訴人們社会經濟生活應該什么样和不應該什么样，政府應該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干預經濟生活，以保证居民的物质福利。这样一来，政治經濟學就不是一門研究經濟現象的內在因果关系的科学，而是研究人們从事經濟活动和政府干預經濟生活所應該遵循的准則。

西斯蒙第強調政治經濟學應該研究人，應該研究人的需要。他把人的需要作为經濟生活應該遵循的准則，同时責難李嘉图忽視人的需要，不注意消費，过于沉迷于抽象，把政治經濟學变成了一門思維推論的空論；說“他們常常为了抽象的理論而牺牲了人和現實利益”（本书第 527—528 頁）。西斯蒙第证明人的需要的存在，这使他比狹隘的資产阶级經濟学家高明得多。但是，他所說的人不是在一定生产关系条件下的人，不是阶级，而是抽象的人。这种人只存在于西斯蒙第的想像里，是被他美化了的小資产者。西斯蒙第正是依据这种人的需要，把它看成是正常的自然的东西，是应当存在的东西，并要求現實經濟生活符合于它。

因此，西斯蒙第不去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規律，而是用小生产者的需要和願望作为評述社会生活的准則，只是訴諸道德和感情。按照他的說法，政治經濟學不是單純計算的科学，而

是倫理道德的科學，只有注意到人們的情感、需要和熱望時，它才能達到目的。他寫道：“一般說來，亞當·斯密對待科學的態度是有些過分拘泥於計算數字，然而從全面來看，科學既屬於感性又屬於想像，感性和想像不需要什麼數字的。”（本書第46頁注^①）又說：“我認為必須反對一般的、往往是輕率的、往往是錯誤的評判社會科學著作的方法。社會科學所要解決的問題比各種自然科學問題複雜得多；同時，這種問題需要良心正如需要理智一樣。”（本書第13頁）其實，他在一切重要問題上，小資產者的“良心”總是战胜經濟學家的“理智”的。

西斯蒙第指責李嘉圖的方法過於抽象，但他自己的研究方法不僅和李嘉圖一樣也是過份抽象，缺乏歷史觀點，而且具有明顯的主觀唯心主義。他指責李嘉圖迷戀於抽象的議論，其實是指責他的客觀主義，即指責他從現實生活出發而不顧人們的主觀願望。

西斯蒙第從人（小資產者）的主觀願望出發，把過時的東西當作自己學說的標本。作為他的研究對象的人首先是消費的實體，這種人只是按照自己的需要來進行生產，因此生產是有限的，它要由消費來決定。生產、收入、人口以及消費之間都有一定的比例，它們的增長必須成相等的比例。這樣一種為小生產所特有的“正確比例”，正是《新原理》的立足點。

在這裡，西斯蒙第突出了人的需要，即消費，要求生產去適應消費。他把消費提到了首要地位，而不是把生產提到首要地位。所以，他反對李嘉圖的為生產而生產的思想，強調生產是為了消費，指責李嘉圖的見解是為了手段而犧牲目的。如果說李嘉圖首先是一位生產經濟學家，那末西斯蒙第首先是一位消費經濟學家，他以

和許多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後繼者一樣，西斯蒙第也接受了亞當·斯密的錯誤見解，認為社會年生產品的全部價值只分解為工資、利潤（其實就是利潤和地租）。他寫道：“總之，國民收入和年生產是相等的，是等量。全部年生產在一年中消費掉，其中一部分由工人消費，他們以自己的勞動來交換，從而把勞動變成資本，並且再生產勞動；另一部分由資本家消費，他們以自己的收入來交換，從而把收入消耗掉。”（本書第75頁）他完全忽視了這個問題：既然生產需要資本（確切地說是需要生產資料），那末年生產怎麼能够以收入形式被工人和資本家全部消費掉？他拋棄了生產資料（不變資本）的部分，也就使自己無法正確地了解資本主義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不過，他企圖把社會年產品的價值分解為收入的見解，和社會收入與國內市場的學說、和資本主義社會產品的實現問題聯繫在一起，指出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經濟危機的必然性。

西斯蒙第從社會年產品的價值僅僅分解為收入的見解出發，得出結論說：生產應該適應消費，生產應該由收入來決定，生產只要不再獲得收入就會停止。他說：“收入是從再生產中來的；但生產本身還不是收入，因為生產只有在實現之後，只有在每一件產品找到需要它或享受它的消費者……之後，才能獲得這一名稱，才能具有這種性質。”（本書第84頁）由於西斯蒙第把收入與生產（即所生產的一切東西）看為是一樣的，也就把實現與個人消費看為是一樣的。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部商品僅僅是以收入來購買，今年生產出來的商品是以上一年的收入來購買的，因此今年的生產要由上一年的收入來決定。至於積累（把收入轉化為資本）或擴大再生產，他认为只能逐步地實現。“假如生產逐漸增長，每年的

替換就只能使人們每年遭受一些輕微的損失，同时却能为将来改善条件。假如这种損失很輕微而又分担合适，每个人都会毫无怨言地承担这种損失。”（本书第 84 頁）

西斯蒙第一再強調生产必須适应消費，并把矛头指向自己的論敌李嘉图，指責他一味鼓吹无限制地发展生产，想給国家开辟致富之路，結果却把国家推向破产。

在《新原理》中，西斯蒙第闡述的主要学說是随着生产的增长，收入按比例减少。他把这个主要学說建立在使用价值和交換价值的对立上，认为由劳动時間构成的价值是資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根源。

西斯蒙第接受了英国古典經濟学家的見解，承认商品的交換价值必須由生产商品时所耗費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原理。他进一步指出，并不是一切劳动耗費都是創造交換价值，都能增加財富的；只有为社会所必要的劳动耗費，只有在增加必要劳动的条件下，才能生产交換价值，才能增加財富。他把必要劳动归結为全社会的需要和滿足这种需要的劳动之間的比例；換句話說，他所說的必要劳动不是由一定社会在一定時間內所有的平均劳动强度和平均劳动生产率来决定，而是要由滿足社会需要所必要的劳动量来决定。

西斯蒙第的这种見解，一方面強調生产商品所耗費的劳动必須是得到社会承认的，必須是社会所需要的，从而正确地指出了創造价值的劳动的特殊社会性质，并把价值量归結为必要劳动时间。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书中，曾肯定西斯蒙第的上述看法是对劳动价值論的貢献。另一方面，西斯蒙第把需求和劳动間的

比例看為是基本的比例關係，斷言每個人一生到世界上就帶來各種需要，正是種種需要驅使人們進行生產，因此生產應該滿足需要，價值規律應該保證消費者滿足與他的勞動耗費相適應的要求。這就是說，供給必須適應需求，生產必須緊跟着消費，消費先於生產並支配生產。

事與願違，現實生活恰好與西斯蒙第的願望正相反對。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大工業不能等待需求的狀況與之相適應，不得不經常以愈來愈大的規模進行生產，生產走在需求的前面，供給強制需求。資本家為了獲取利潤，不斷地擴大生產，採用新的技術和新的生產方法，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商品的價值。從而，只要能在一小時內生產出過去需要兩小時才能生產的東西，就會使市場上所有這一類的生產品的價格下降。競爭迫使生產者出賣花兩小時生產的產品時不能貴於花一小時所生產的產品。由此，競爭實現了產品的交換價值由生產它的必要勞動時間來確定的規律；同時，勞動時間成為交換價值尺度這一情況，因而也就成為勞動力的價值和價格下降的規律。這就是說，競爭迫使資本家壓低生產費用，減少工資支出，同時也使利潤率下降。

西斯蒙第指出，商業的擴展總是以縮減工資、利潤（包括利息）為基礎的。他舉例說：一個企業主擁有十萬法郎的流動資本，每年增殖的利潤是一萬五千法郎，其中六千法郎是利息，九千法郎是企業利潤。這位企業主雇用了一百個工人，他們的工資是三萬法郎。現在如果他的投資增加了，生產擴大了；資本從十萬法郎增加到四十萬法郎，其中二十萬法郎為固定資產，二十萬法郎為流動資本。利息等於一萬六千法郎，利潤則為三萬二千法郎，因為利息率已

从 6% 下降到 4%。工人人数将增加一倍，每个工人的工資則由三百法郎下降为二百法郎，总共为四万法郎。由此可見，生产增加了三倍，而收入則連一倍也沒有增加到（起初为四万五千法郎，現在則为八万八千法郎）。

毫无疑问，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收入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减少，这是事实。西斯蒙第感觉到这种矛盾，指出工資和利潤率的下降趋势是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必然后果，明确地指出問題完全不在于机器的使用，因为机器本来可以給人类带来好处，問題在于不合理的社会組織。他写道：“真正的灾难决不是由于机器的改进，而是由于我們对机器的产品所进行的不公平的分配。我們越能够用有限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制品，也就越應該增加我們的享受或休息”；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提高了工人的生产能力，强迫工人拿同样的工資，可是每日的劳动时间不仅沒有縮短，反而更长了，这是当前的奴役工人的社会組織造成的。”（本书第 450 頁注^①）

西斯蒙第駁斥了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被机器排挤以后能够得到补偿和使用机器对工人有利的错误論調，坚持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进步和財富增长往往使工人遭到損失的見解。他正确地认为，虽然采用机器会使产品的价格下降，但是对于丧失了一部分收入的工人來說，产品的降价如同画餅充饥，无补于事。

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与消費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就在于：在財富增长的同时，人民的貧困也在增长，社会生产力增长了，人民的消費却沒有相应地增长。这正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一种为生产而生产的傾向；资本的一般生产规律是，

“按照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也就是按照用一定量资本剥削最大量劳动的可能性)进行生产,而不考虑市场的现有界限或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现有界限。而这是通过再生产和积累的不断扩大,因而也通过收入不断再转化为资本来进行的,另一方面,广大生产者的需求却被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平,而且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必须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平。”^①

按照西斯蒙第的见解,商品仅以收入来购买,而收入则随着生产的增长而减少,从而破坏了他所设想的生产与收入间应有的比例,破坏了他所要求的生产与消费间应有的比例。他断言分配上的不平等,使国内市场缩小,正是生产与消费间比例的破坏,使得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的爆发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不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盲目地发展生产,必然使产品找不到销路,造成生产过剩。“由此可见,由于财产集中到少数私有者手中,国内市场就必定要日益缩小,工业就必定日益需要寻求国外市场,因而该国的工业就要受到更加巨大的波动的威胁。”(本书第217—218页)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虽能从国外市场实现其产品,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整个世界将形成为一个市场,再也不能找到新的购买者。

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过剩危机的必然性是西斯蒙第的巨大功绩。但他认为危机的根源是在生产条件之外,是由于消费不足。他把人民群众和工人的消费不足提到首要地位,以此作为危机的根源。这是经济学上用消费不足来说明危机理论的典型。

正确地评价西斯蒙第关于经济危机的学说,首先必须强调指出他阐述危机问题的基本原理是完全错误的。他和资产阶级经济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册,第610—611页。

学家李嘉图和萨伊一样，错误地认为社会年产品的价值仅仅分解为收入，抛弃了不变资本部分，不了解为生产消费领域服务的市场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意义。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是不仅不变资本的绝对量不断增长，而且不变资本的相对量也是不断提高的。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对不变资本的要素即生产资料的需求，要比对可变资本的要素即消费资料的需求增长得更快。西斯蒙第认为年产品等于收入，把实现和个人消费混为一谈，造成自己对资本主义市场的错误观念，看不见日益增长的生产资料市场。他不了解随着小生产的破产，国内市场反而会扩大，因为国内市场的扩大既靠个人消费品市场的扩大，更靠生产资料市场的扩大。他企图用国外市场来解决资本主义的实现问题是无济于事的。

当然，西斯蒙第对经济危机问题的见解是有贡献的，他的功绩在于：指出了生产过剩危机的必然性，揭露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强调了个人消费问题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重要作用。但他不了解生产与消费间矛盾的性质，把它看为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他错误地用消费不足作为危机的根源。不错，生产归根到底要受到消费的制约，然而危机的根源不是消费不足。群众消费不足是一切剥削制度社会里所共有的现象，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里都存在群众消费不足的事实，却没有发生过生产过剩危机；危机是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并且，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表明，正是经济危机爆发以前的时期，工人的消费有所增加。另一方面，从危机过渡到萧条、复苏，也根本不是由于工人消费增加的结果。照例危机的出路是从生产资料的销售量扩大开始的，推向复苏和高涨的动力是

固定资本的更新。因此，不是个人消费的增加决定生产的扩大，恰恰相反，是生产的扩大引起个人消费的增长。

西斯蒙第把生产和消费间的矛盾看为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由此把资本主义看为是历史的过渡形态，但他只是从分配关系中看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质。他还不了解分配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一种形式，一定的分配形式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社会特点和生产代理人的一定社会关系为前提；工资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这种只是历史地看分配关系而不是历史地看生产关系的观点，从一方面来说，只是一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最初的、还是软弱的（不彻底的）批判。从另一方面来说，它是把社会生产过程和简单劳动过程（这种过程就是假设没有任何社会帮助的孤立的人也要完成的）混而为一的结果。

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的生产，由于它本身的内在规律，一方面不得不这样发展生产力，就好象它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另一方面它又毕竟只能在这种局限性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这种情况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是资产阶级生产中种种尖锐矛盾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资产阶级的生产就是在这些矛盾中运动，这些矛盾，即使粗略地看，也表明资产阶级生产只是历史的过渡形式。”

“其次，这一点被例如西斯蒙第粗浅地但又相当正确地看成是为生产的生产同因此而排除了生产率的绝对发展的分配之间的矛盾。”^①

（四）

西斯蒙第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毫不犹豫地指责资本主义的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册，第86—87页。